

民营经济研究

自1978年至今,伴随着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并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文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东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不同发展绩效的。也就是说,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态势正在逐渐成为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意识到这一点,解释不同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差异便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相关文献近年来也显得异常丰富。

虽然近年来西部民营企业发展速度较快,与东部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两者的绝对差距却仍在持续扩大,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西部仍无上乘表现,在短期内难以普遍赶上来(孙早、刘靠柱,2004)。很多研究从自然地理条件、财政分权(Qian and Xu, 1999、制度变迁等角度对东西部地区间民营企业发展差距问题作了深入地探讨,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弗朗西斯·福山(1995)认为,文化因素和经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正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美、英、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之间不同的社会信任度,进而导致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发展绩效。格雷夫(A. Grief, 1994, 1998)在考察了中世纪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文化差异对其经济活动形式的影响。正是受穆斯林社会价值观限制了马格里布人在扩展对外贸易代理关系时与非马格里布人之间的合作,而热那亚人受基督教个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了开放式的关系扩展。不同文化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形式直接决定了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地区大多远离历代统治中心地域和海洋文化的影响,而且又为众多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必然与东部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

文化差异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影响的比较分析

□ 马素英

形态,这多少也会影响到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接下来从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地区文化3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东西部地区不同的人文制度环境对当地民营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以浙江和陕西两省的情况为个案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自然地理文化

我国东部地区多平原,地少人多,人地矛盾比较突出。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就要求当地人民精耕细作,细致入微,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现出了“能握微资以自营殖”、“小中见大”的特点。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就是从人们不屑一顾的弹棉花、小纽扣、小牙刷、小五金等小商品做起,占领了大市场。扬州“三笑”集团凭着一支牙刷打天下,全年销售额数十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一半以上。浙江温州民营企业凭着“小商品”开拓“大市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柳市镇改革开放出的“八大王”均是从小处着眼的典型。此外,东部地区靠近海岸,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灵活、善于变通、“人事机巧”,“股份合作制企业”就是温州人灵活、善于变通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与此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多草原、高原和山脉,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和高原文化。当地社会文化也因之形成了一种求大、粗犷、豪放的社会风气,人们在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中常以“大”为荣。历史上种地不以亩计算,而用垧(相当于江南等地的四亩地),“银数不计奇零。如至两不计分厘,至百十不计钱分”。其中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群山环绕,北有横山山脉,西有子午岭,向东以黄河天然与晋地隔离,地形较为封闭;南部以山地为主,位于秦岭山脉和巴山脉之间,交通不便;中部有秦川平原,三面环山,东面临水,与外地天然相隔。在这种较为封闭的地形环境中积累沉淀下来的三秦文化就表现为开拓进取精神不够,封闭保守过多。另外,关中地区平原地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之一,农业经济使三秦文化中具有了农耕文化的特征,表现为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重农轻商的社会

传统。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种文化的约束和阻碍。

二、历史文化

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形和地理条件，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此建都，仅长安一地建都时间就长达一千多年。当时，陕西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交通开始发达起来，受其影响，尤其是汉唐盛世的文化精神，如开放改革、融合纳新、开拓创新等精神，在早期历史阶段呈现出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但唐代以后，国都迁出关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此后，地理环境，特别是地形封闭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暴露出来，使得宋元以来的三秦文化逐步趋于封闭保守。加之小农经济的影响，文化中逐渐孕育出了一种怀旧历史惰性，安于现状，重土乐天，知足常乐，即使对现实产生不满情绪也不去积极努力、开拓创新，更多的时候是回想昔日的盛况，以消除心理上的不满。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尤其在民营企业还得不到合法地位的时候，当地的政治官员和人们更加不敢冒进，来个什么“陕西模式”或“关中模式”的创新发明了。

相反，国都的南移使得南方逐渐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经济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北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就有普通工商业者的作坊，有追求经济利润的活动，私人经济的萌芽最早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据史载，在北宋，温州就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在18世纪近代海运交通兴起以前，苏州就已成为全国性米粮市场贸易中心。辛亥革命前，江苏地区就发现了不少的榨油作坊和工厂。明代早期，浙江台州市自然经济就开始分化，手工业和商业就有较大发展。《嘉靖太平县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乐，以农商为主。向有为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温州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鞋业基地，而在历史上，清末温州就已出现了制鞋业，20世

纪30年代温州皮鞋已成名品。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从宋代以后就一直有着强烈的经商意识和传统，当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政策环境稍一好转，民营企业便大量涌现。1978年下半年，温州柳市镇有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在外部宽松政策的催化下，1981年已发展到了300多家。

三、区域文化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虽然儒家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如晋楚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吴文化等。受不同的区域文化中所体现的不同文化思想内涵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陕西的关中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底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其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仁义，“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认为“义，利之本也；义利之足也，有义然后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整体为本体，追求圣贤的思想人格，以公灭私、德本财末。这些文化思想形成了当地人不善经商，忽视富商豪贾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传统思想。而“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则体现了温州的地域文化。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的学者、思想家叶适，集中了“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加以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种追求功利、务实求效的思想体系，对后来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提出了“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在物质和道义的关系上，摒弃了那种“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温州人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自宋朝以来，温州人就学会了运用自然资源进行商品生产，形成了“为市场而生产”的传统。另外，“永嘉学派”中务实求效的思想，既不做空洞的玄学讨论，也不理会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自始至终追求“经世致用”，

孕育了温州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千万”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万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争得千斤万银。目前，浙江省已有几百万人在外地务工经商，在北京、天津、新疆、河北、广西等地兴办了20多个分市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浙江村”、“温州街”、“义乌市场”等。古已有之的重商传统，认定了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标。浙江温州人不因“小”而不为，而是从市场出发，靠着“小商品”赢得了“大市场”。

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少数民族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西部地区人口的绝大比重。除陕西、重庆、四川和甘肃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10%以外，其余的均在20%以上，西藏最高为94.07%，其次为新疆59.39%，云南的少数民族多达20多个。这样，多民族文化，再加之传统宗教的密集分布，形成了西部独特的“孤岛文化”。同一个文化团体中的人们在交易和交往过程中，由于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对自己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非常熟悉，协调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交易和分工也就越发达，企业发展也就越快。但处于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排斥，缺乏对别种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甚至不同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习惯和规则是相互冲突的，再加之不同民族之间语言的障碍，这导致跨民族、跨宗教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和交易的协调成本很高，难以进行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率的交易，企业间的交易和分工也就越落后，企业发展就越慢。 □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政史系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西路74

号0127信箱

邮编：710061